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王 政

妇女学(women's studies)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高等院校出现,如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已被纳入美国教育体制,七百多所高等学校建立起妇女学教学机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加。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国女权主义挑战本土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实践活动,很快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实践。进入21世纪,妇女学不仅不再是美国的特产,也不局限在欧洲、北美、大洋洲,还遍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妇女学全球化的现状无需多做论证,读者只要上一两个网站便可对其概貌一览无余。^①本文要讨论的是妇女学全球化的含义,并以全球化的妇女学为背景,来探讨中国的妇女学发展前景。

一

为什么妇女学会成为跨文化、跨国界的女权主义在学术和教育体制内的实践?原因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第一、在20世纪下半叶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很快波及北美和欧洲女权运动高涨的国家;第二、全球化过程中东西南北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减少了知识沟通障碍;第三、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依然存在的权力和资源不等关系有助于任何西方或北方的“发明”流向东方或南方,而反方向运动则远为艰难;第四、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以纳入边缘人群的经验 and 知识来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对任何尚存男性知识霸权的地方具有实际意义;第五、女权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所要分析的是以往任何一

① <http://research.umbc.edu> 网站搜集了七百多个世界各地妇女学机构的网址(包括美国)。<http://www.artemisguide.com> 网站提供美国各妇女学机构网址。

个学说所忽略的问题,即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而且,对于社会性别制度在各个文化中的产生、表现、发展、变化及其与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等级如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的交叉关系等议题可以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中针对自己的情况来深入具体研究,如同阶级、种族等分析范畴一样,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的研究;第六、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学术活动所产生的新知识不仅要通过出版物来传播,还要通过教育体制来达到传承和发展、进而改变教育内容、改造知识生产、改变人的认知、最终改变社会文化的目的。总而言之,主要产生于美国的妇女学在过去30年里变成了全球的现象,不仅在于美国以及英语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更主要的是这个新兴学科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所提供的分析工具和教学手段有助于这个理念的实现。来自霸权国家边缘人群的批判理论和方法显然对世界各地有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

在美国本土,“妇女学全球化”具有另一层意思:即改造现有的妇女学教学内容,突破妇女学对美国本土关注的局限,使之包容全球妇女的活动和经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做出反应。虽然美国妇女学课程从一开始就包含多学科女学者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虽然妇女学学者始终追求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创造新的跨学科知识,但是任何知识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都有“本土”的限制。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它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受到学生关注问题的制约。同当代中国青年迫切面向西方、急于“同世界接轨”的心态截然不同,处于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人往往认为自己就是“世界”。在资本主义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在当前保守政治势力上升、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一般青年更关注的是自己的谋生和前程。当许多美国大公司在全球追逐廉价劳动力和高额利润时,当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向全球扩张的新帝国时,一般美国人缺乏对“全球”的概念和关注。在这样的文化限定下,美国妇女学课程内容过去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结构所限定的妇女状况以及大学生在当代美国文化中面对的问题来设置的,所以,美国妇女学是美国本土化的妇女学。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对美国妇女学表现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局限性有许多探讨,并有突破局限的种种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把美国白人妇女之外的其他种族妇女的经历和议题纳入妇女学,妇女学多元化的探索得到教育体制内外在资金上的支持。如,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发起了“把少数族裔妇女学主流化”的项目,

①关于美国妇女学全球化的实践,参见美国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妇女学季刊》1998年第3、4期(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XXVI, No. 3&4, 1998)。

②密西根大学和马里兰大学项目的联合对象中都包括中国的妇女学教学机构。

赞助了美国各地13所高校妇女研究人员、尤其是少数族裔女学者参与的妇女学课程发展活动。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急剧扩张的新局势以及以'95世界妇女大会为标志的全球女权运动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美国妇女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把世界各地的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状况融入妇女学教学内容以及如何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一个特定地区包括美国的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状况,这两点成为突破美国妇女学局限的学科发展具体内容。1995年,福特基金会协同全国妇女研究委员会(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个新项目——“综合妇女学、国别学、国际学课程项目”,来推动美国妇女学发展全球化课程内容,要求妇女学联合学校里从事国别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学者开设新课程,尤其是鼓励妇女学开设关于非西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课程。全美13所大学获得赞助参加妇女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和发展。^①美国各地妇女学课程发展如今依然在朝这个全球化的方向努力,一些规模较大的妇女学中心或系不断开展各项研究和实践的课题,推动课程改革,如笔者所在的密西根大学正在开展一项全球女权主义口述项目,联合了其他3个国家的妇女学者对本国的女权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访谈,所得访谈录像、录音将纳入4个国家的妇女学教学内容,以此来形象地向学生展示和比较全球各地多样的女权主义议题和行动。再如,马里兰大学联合了其他5个国家的妇女学机构共同研讨妇女学课程全球化的具体措施和内容,包括各国教师和学生的互访交流、合作发展远程教学和联合开设新课程等。这些国际项目都特别关注和非西方国家妇女学者的合作。^②

美国妇女学全球化的努力所体现的是女权主义学者对美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所处的霸权地位的警觉。美国的霸权地位已影响到美国人的经验,影响到美国人的主体身份的建构;而且,处于全球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经历。那么,如何理解各国妇女不同的社会性别经历?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差异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引进非西方妇女的经历时避免不要仅仅是“添加”非西方妇女,而是真正改变西方中心的立场,在美国的课堂上突现非西方妇女的立场观点和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视角?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才能在提高美国学生对殖民关系认识的同时不再复制这种殖民关系?这些是美国妇女学学者清醒意识到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外,她们还特别关注急剧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对各国妇女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商品全球化、消费文化和文化生产等过程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包括伴随倾销西方商品而建立的西方男性

中心对女性的垄断审美观对全球各地妇女身体的掌控和摧残。女权主义学者在批判其他全球化理论的社会性别盲点的同时,强调在全球化研究中关注阶级、种族、族裔和社会性别的交叉关系。一些反映非西方底层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的视觉和文字材料被妇女学教师用于课堂教学,如记录片《全球流水线》,表现的是跨国公司对亚洲诸国底层妇女的剥削和女工们的反抗。类似的记录片和阅读材料以形象的例子帮助美国学生认识在全球的等级结构和新殖民主义关系中,非西方的有色人种妇女是跨国资本攫取高额利润所寻求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并促使学生思考行动方案。美国妇女学学生参与反抗跨国资本对非西方妇女的剥夺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女权主义团体通过媒体暴露了一些接受耐克公司定单的厂家在亚洲地区对当地女工的残酷剥削,美国各大学的妇女学学生和妇女团体组织起全国范围的校园抵制耐克产品的活动,迫使耐克公司采取行动正视亚洲女工的权益问题。所以,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各国女权主义如何结成联盟形成一支有力的全球批判抵抗力量也是妇女学课程关注的议题。^①

妇女学全球化的课程发展在美国尚处于初期阶段,其反对西方中心的实质使妇女学保持了批判美国主流文化的前沿地位。这种学科中的开拓性行动自然会遭遇先行者的困难和障碍,不仅有前面提到的理论性和智性工作的挑战,还有具体物质限制,包括对新课程教师的聘用和新教材的生产(对全球化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等)。可以想像,这个课程改革在各高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取决于各个学校的妇女学师资力量,也与各个学校的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总之,美国妇女学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教学内容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妇女学学者认识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对课程内容“全球化”的追求正处在当前的“出新”过程中。

二

美国妇女学全球化课程发展对我们正在进行妇女学学科建设的中国学者有什么意义呢?由于中国妇女学的建设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女权主义实践的启发,并引进了不少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著述,中美妇女学者也有许多直接的交流,可以说我们这个正在崛起的新领域与美国妇女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可以是推动我们发展妇女学的力量,也可能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形成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妇女学的长期实践和女

①80年代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批评西方女权主义的旅美印度妇女学学者莫汗蒂最近撰文,申明她的“在西方人的眼中”一文是针对当时西方女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殖民关系,但她并非把“西方”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做截然对立的界定,也不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可能结成联盟,相反她是在“一个团结和分享共同价值的框架之中”进行批评的。文中她呼吁女权主义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见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2003, pp. 499-535。

权主义学术的丰硕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和资源,这无疑是已经发生和会继续下去的情况。但是如果它成为我们借鉴的惟一来源,那就可能限制我们的视野,因为如前所述,美国妇女学是本土化的妇女学,它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我们在许多方面同前殖民地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相似,但是受语言和资源的限制,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妇女学学者却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美国女权主义学术的密切关系本身就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一个表现。那么,身处现存的权力结构中,我们如何在保持这个密切关系的同时在我们的新兴学术领域中不去复制或巩固西方中心主义?美国妇女学全球化行动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和警觉。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自己在全球化背景中出现的妇女学课程如何面对全球化?显然,在中国主流话语中,“全球化”这个词同美国妇女学的全球化有很不同的含义,搞清这个词义的差别是继续讨论的前提。“全球化”包含着复杂的内涵,处于不同地理位置和阶级位置的男女在“全球化”中有不同的经历;“全球化”过程既包含资本的扩张、殖民关系的延续发展,也包含全球抵抗力量的跨国界行动和效应;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对各社会群体的效应是复杂和矛盾的,并非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所能概括。在此笔者无意对“全球化”做一个全面的界定,而是希望凸现中国主流话语中的“全球化”意义中的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大众传媒和官方语言对全球化做了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却很少有人关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中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等等社会等级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且,在主流话语的再表现中全球化与西方化紧密相连。这些全球化美景包括买汽车、住洋房、享用高科技设备和进口商品,包括文化产品,另加出国旅游。与20世纪50年代宣传共产主义美景相似,好像人人都将享受到这个全球化美景(传媒再表现中“成功”的男性已经在享受全球化,其中包括享受女性的各种服务),人们的心向往之则胜过50年代。如果说50年代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美景心存疑惑,当前却少见知识分子出来对这类全球化再表现质疑。确切地说,“文革”后急切地“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是演绎和宣传官方转型政策的主要力量,并由此而重建自己的精英地位。处于精英地位的知识分子还往往把自己在转型期获得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普遍化,无视在转型期向下流动或无法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这种心态并非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独有,如在

英文杂志《标志》组织的对全球化和性别问题的专题讨论中,一位中国女学者以中国妇女的代言人身份,强调国际上对全球化的批评与中国的“本土”情况不符,她声称:“从本土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即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妇女的生活和地位改善了……对中国妇女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每个女人都会有机会超越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去做一个人。无论全球化产生多少新问题,还有什么能比‘选择’更重要?”^①

这里表述的并非个别人一厢情愿的想像,而是我们在中国当代主流话语中司空见惯的全球化神话。它遮蔽了权力和等级关系,无视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以抽象的“中国妇女”一词掩盖了中国处在地理或社会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那无数没有话语权、无望获得发展机会的最底层的各类各族女性。有趣的是,这个所谓的“本土视角”表达的却是对非本土价值观不假思索的认同。把个人选择自由作为最高理想本来是美国个体主义的文化特产,中国学者自然可以认同;而且,在以西方为模式的中国“全球化”、“现代化”热潮中,是否认同美国价值观经常成为“先进”与“落后”的标志。只是我们怀疑那本土“沉默的大多数”是否也会把超越一切社会关系去获得选择的自由作为一种向往。可以断言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每个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女人获得这种机会,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深圳外资工厂里被烧死的年轻打工妹,现在依然时时发生的“过劳死”和因职业病而失去劳动力的女工,在西部和其他贫困地区的几百万失学女童、在城市中因失业、下岗、福利和医疗制度改革而出现的新城市贫民,包括众多失去全民所有制工人身份向下流动为保姆的妇女,在农村中为一家人的温饱终日劳作失去健康而无钱医治的农妇……

拥抱主流话语中的“全球化”神话,甚至冠之“本土视角”来抵制国际间的批评理论,而不是运用各种批评武器去分析解构这神话形成的社会历史政治过程以及其所遮蔽的社会复杂现实和权力关系,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妇女学者的警觉。我们从事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学者可以说都是处在有话语权的精英地位,我们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享有特权的位置上开创一门表达边缘弱势群体的声音和经历的知识?我们的精英地位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知识创造活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立场不为自己的精英地位所腐蚀?对这类问题的认真思考和采取对策恐怕是我们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领域的前提,也是我们清醒地解构“全球化”神话的前提。

①Li Xiaojiang,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Where Are Chinese Women?*, in *Signs*, 2001, Vol. 26, No. 4, pp. 1277 ~ 1278. 引文为笔者翻译。

①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围绕生命专利的斗争,参见施鹏翔、卢思骋、林燕梅的《新世纪的圈地运动:生命专利》,《视界》,2002年第7期,2~29页。

②在此及以下对斯皮瓦克的引用均见:Jenny Sharpe,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onversat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Signs, 2002, Vol. 28, No. 2, pp. 609~624. 引文为笔者翻译。

③The Subaltern (下属群体)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20世纪30年代在狱中写作时用的词,指从属的社会群体,他们缺乏那些有权势的群体的组织力量。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家借用这个词来指处于低等级的社会群体,这个下属群体在印度的社会背景中比葛兰西所指的30年代的欧洲工人阶级更缺乏通向政治权力的渠道。斯皮瓦克在这儿界定为“无法加入向上社会流动运动的人群”。她最有影响的文章题为“下属群体能说话吗?”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针对一些读者将她误解为悲观地认为下属群体不能够表达自己,此访谈说明她那个问句的文章标题是表达自己对下属群体无法发声的愤慨。

对于“全球化”与“本土”的关系,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有许多思考。虽然每个本土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使得非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在探讨中国妇女学的本土化时,倾听和了解其他非西方学者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印度学者斯皮瓦克是把女权主义议题引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人物,她始终关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殖民关系,关注这种权力关系在“全球化”中的运作。在这种关注中,她对自己的精英地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不断以批判解构的声音来提醒其他处于精英地位的女权主义者。2001年她接受另一位印度学者杰倪·夏珀的访谈时,对自己作为一名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在全球化中的立场和观点有很清晰生动的阐释,所涉及的议题同本文讨论的主题有关,在此做个简要的介绍。

当国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较多关注人口流动和迁移国外侨居人群的问题上时,斯皮瓦克提醒人们不要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都市化,而要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在农村中的效应。她揭露跨国公司的种种垄断策略是如何直接影响了南亚农民的生活,如对种子做基因处理使农民无法按常规留种而不得不依赖跨国公司,救灾的小额贷款附加农民必须用基因种子的条件,专利权把非西方的农民在几千年里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攫为己有,化肥作为奖励形式已经成了农民生命周期的一部分等等。^①西方资本对东方或南方农村的侵入不仅占领了许多传统中属于妇女的知识和技术领域,更重要的是把农业社会的一切重新编码,作为抽象的数据处理,这个过程对底层农民生活的意义尚未引起学者的关注。针对那种认为电子技术使第三世界妇女有了走向全球市场的渠道的论点,斯皮瓦克明确地指出,表面上这种观点说的是事实,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去想究竟是哪些人有了这种渠道?“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人群没有上网的渠道,她们甚至不知道英特网是什么。这是地球南部最大的人群。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结构而提上网渠道是不会导向一个公正的社会的。”^②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斯皮瓦克始终从“下属群体”(subaltern)的角度来看问题。^③从这个角度看,她不仅时时警惕跨国资本的权力,也关注全球的活动分子包括女权主义活动分子的行动成效。她批评在社会性别培训中以上层女权主义者作为农村贫穷妇女的榜样,她质疑在全球层面的激动人心的女权主义活动——包括动用大量资源的世界妇女大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最底层妇女所处的社会基础结构?她犀利地指出:“人们没有看到,即使那些组织

活动的自封活动家的欢欣鼓舞在那些被召集到这个场合的下属群体妇女中也表现出来了,但这还是那些更幸运的妇女所以为的意思。这种欢欣鼓舞仅属于这个场合,而不是长远的结果。”她提醒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去思考究竟是自己还是底层妇女从自己从事的活动中获益更多?这些活动和底层妇女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不仅要清醒地看到活动分子和底层妇女的社会位置差异造成的认识角度差别,还要注意“以妇女为中心的慈善事业和参与民主教学,这两件事之间是有区别的”。她此刻最密切关注的是后者,即知识精英如何同“下属群体”一起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结构的变革。作为密切关注“下属群体能否说话”的精英学者,斯皮瓦克提出以“田野工作”作为“参与民主教学”的途径。知识精英只有深入“下属群体”的社会,获得她们的信任,才可能真正了解“下属群体”。这种“田野工作”不是急功近利地为了自己发表作品搜集材料而去(“那种类似廉价购进高价售出的商业资本主义行为”),那样会把精力放在处理信息上,而不能真正学到新东西。这种“田野工作”对知识精英来说是一种重新学习,是解构自己以前知识的过程(精英学者无意识中内化了的殖民主义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用在“下属群体”中有意义的语言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能够区分那些对我们是一种编码方式而对她们是另一种编码方式的事物……普遍性在社会性别培训中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在谈到文化差异时,斯皮瓦克强调她当前更注意的是国族内的文化差异,即阶级的文化差异,而不是按国界来区分的文化差异。在往常的阶级形成的机制之外,在同一文化中还有内部的文化差异。国族内的阶级文化差异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有相互作用,它同新的全球化的经营管理和金融文化的形成有关。在谁能获得上网的途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可以看到阶级的文化差异。

虽然斯皮瓦克的思考是一个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面对全球化的探索,具有深厚的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背景,与当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差异很大,但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实践的读者会看到一个相似之处,即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和清晰的阶级分析视角。在此笔者无意论证斯皮瓦克思想的渊源,而是想说明:如果我们认为斯皮瓦克这样的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思考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也不妨把搜寻理论资源的视线拓宽到自己曾经的革命历史,看看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底层人民沟通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和实践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或调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实践应该可以提供给我

们不少经验教训,只是重提中国革命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中可能会显得过时而不够“现代化”和“全球化”。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运用斯皮瓦克的解构方法,进一步问:是怎样的社会历史过程把复杂丰富的中国革命封存在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中?一个脱离了对底层社会群体和社会基础结构关注的“现代化”“全球化”目标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中出现的?是什么社会力量运作的结果?这个过程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是什么?妇女学课程内容如何体现用社会性别和阶级分析范畴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做出分析?

斯皮瓦克对印度“本土”表达了深切的关注,但是这个“本土”从来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非历史的固体,而是非常具体的社会性别、阶级、族裔在依然存在殖民关系的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动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状态。各个社会群体的人有不同的“本土”经历和需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要倾听的是“下属群体”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声音,了解这些无法在主流政治文化思想话语中发声的人们的生存状况,而决不把自己作为“本土”的权威代表。相反,她那把不妥协的解构利刃也被用于对自己精英地位的剖析。斯皮瓦克对本土的态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示范,即把立足点放在本土的底层社会,沉下去通过“田野工作”来获得对本土的知识,寻求同“下属群体”一起改变本土“社会基础结构”的实际途径,而不是从自己所处的精英位置出发来“代表”本土。知识精英的“代表”往往是一种“再表现”,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运作,所表现的是知识精英本身的各种需求和欲望。

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知识生产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不仅体制性的知识生产机构集中在中心城市地区,所生产的知识内容也远离乡土向西方靠拢。这个过程既塑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由他们来参与这个过程的——更确切地说——主要由男性知识精英设计和推动的。若要在中国研究“阶级的文化差异”的形成和意义,恐怕不能不关注这个西方化(“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与中国现存阶级差异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妇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怎样才能避免步男性知识精英之后尘?如何真正以底层阶级的大多数——妇女——的经历来重新建构知识?如何使新知识的生产和新知识分子的培养能产生缩小而不是扩大各种等级差别的效应?如何把处于中心城市地区的妇女学学科发展工作同边缘的妇女相连、同改变社会基础结构相关?在我们确立起妇女学是从边缘位置向中心挑战的基本立

场之后,还需要花大力气探索这一类实践性的问题,以寻求切实可行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也只有这种坚持从边缘的妇女立场出发,不断寻求缩小差异的具体措施的每日本土实践,才可能消除仅仅属于知识精英的“本土性”焦虑。

附：关于“gender”的翻译 及其背后

王 政

2002年12月,我出席了“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女性主义教学法的研讨会。20日午后去开会的途中,华南师大有位老师告诉我说,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性别”这个翻译法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在中国,“性别”本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引入“社会性别”结果把人们搅乱了,把我们对中国的本土认识搅乱了,因为我们中国的性别和西方的性别是不一样的,所以用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多余。她问我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当时我们在路上说话,没有时间充分讨论。其实她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值得认真探讨。

把gender翻译成“社会性别”,我们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在我们之前,国内一般把gender翻译成“性别”,包括世妇会前后官方的文件翻译也是如此。而在我们学会翻译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一直是译成“社会性别”的。在中国介绍和推广“社会性别”这个理论上我们学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所以我想从翻译介绍者的角度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辨析》中对“社会性别”这个词有较多的解释,此文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的《妇女研究论丛》上。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背景下,我们知道语言的重要性,人的主体建构和语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语言是广义的。在妇女学学科背景下,我们对每个词非常慎重,对关键词,更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反复考虑的。

为什么用“社会性别”来翻译gender呢?首先,我们注意到英语世界学者对sex和gender的讨论过程。为什么她们要开创出一个新的词gender,而不用以前的sex role?在早期的时候,西方学者较多地用

sex role,社会学领域中 sex role 用得很普遍。但是到后来为什么觉得 sex role 还是不能说明问题,要用 gender 这个词? 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表达一种新的认识。盖尔·卢宾在她的 *Traffic in Women* (《女人交易》)中,已经把前期讨论的认识提高一步了。她看到不光是我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sex role 讲的还是女人、男人扮演什么角色),而是在人类社会有一套组织人类性的活动的方式和机制。她这种认识是受了马克思的启发而产生的。马克思讲人类的经济活动,他对商品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的流通、对劳动的组织、劳动力作为商品、剩余价值的产生等等过程做了细致分析,从中阐明阶级的产生过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阶级的产生,这是马克思的一套分析。在他的分析之前,也没有人用“阶级”的概念,但不等于说这之前没有阶级。马克思创造了阶级分析方法之后,学者们认为阶级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中,阶级关系以及表现形态不尽相同。

女权主义学者对人类社会的性的活动和组织做了分析,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就看到以前我们没有一个词来界定人类对性的活动的组织,而且在这个组织中间怎么就把人规范成男人、女人,有一整套体制,婚姻制度也好,性的制度也好,家庭制度、性别的劳动分工等等,都涉及到把人怎么规范起来、组织起来。人类活动不光是吃饭,《孟子》中就有“食色,性也”的话,不光是“食”的问题,食是一个经济活动的问题,还有“色”的问题,就是性活动。人类性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内涵也是非常多的。性活动在各个社会中究竟如何被组织,在女权主义学说之前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理论探讨,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记载,如小说和历史叙述都有,真是太多了,这是人们的基本活动,有太多的描述,文字的或视觉的、实物的。但是作为理论的阐释,把这一套活动和社会造就男人、女人的关系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学术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当代学者就用 gender 这个词来标识这一大套的理论认识,标识社会把人区分为男性、女性的各种机制和过程。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中都那么明显地规范男性、女性的界限,更不是所有的文化或历史时期都对男性女性做出相同的规范。但是不是说因为规范不同就不存在社会性别机制? 不是。不同内容的规范其实是表达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机制。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量研究都是努力探究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从对男女的不同规范要求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或不同的社会性别机制,或这些关系和机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中的变

动状态。当一些社会形态不是卢宾所研究的那种亲属社会文化(女人被直接交易来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男性女性的规范是通过什么机制来维持和巩固的?对男女的规范和界定作为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对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产生作用的?在卢宾之前和之后都有大量的研究。“社会性别”不仅仅是理论概念的标记,而且已经是一个学术领域了。

在翻译中我们觉得如果用“性别”这个词,就不能表达出这一大套的理论,那是那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所做的探索。要把背后蕴藏的理论含义表达出来,非得也创造一个新词,因为英语国家的学者创造一个新词也不是凭白无故的,而是希望能够表达一套新的理论概念。更何况,围绕 gender 和 sex 的大量学术研究已经使这两个不同的词指代不同的事物(虽然两者有诸多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仅用一个“性别”来涵盖两个不同的、内涵复杂的英文词,那必定会在翻译中造成混淆和误解,也会缩减原文的含义。所以我们认为“社会性别”可能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词,它既跟性别有关,又与我们汉语中所理解的性别有很不同的含义。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用“社会性别”这个中文词来翻 gender,我们觉得是不满意的。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谈到,因为强调的还是性别,而不是社会文化机制对人的规范,这就是翻译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翻译一般难以做到非常贴切,特别是当一种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对应物的时候,比如他们有面包,我们也用烤箱做个面包,他们那个“bread”我们就翻成“面包”,那还比较贴切,双方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没有什么误差。但比如我们的“饺子”,英文就比较难翻,他们没有饺子,用意大利的“dumpling”总归是不对头。两个文化中不同的现象出现,你不能找到对应,硬造一个词出来套,总归是有距离。这种文化的隔阂是非常难完全跨越的,不要说概念性的东西,就是食物有差异也难翻译,这是翻译上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希望用一个词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新的词,代表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台湾学者用的“性/别”也是一种翻译策略)。

那么,是否中国的“性别”二字已经具有“社会性别”的含义,所以就不需要用“社会性别”这个词了呢?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辨清:第一,“性别”二字并不包含“社会性别”所指代的新的理论探索和成果,起码是在我们开始翻译介绍 gender 这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性别”一词不包含对社会性别制度和机制的认识。今天有些学者说“性别理论”,可能他们是指 gender 理论,也可能指和 gender 理论没有太大关系的

论述,也就是说,gender理论的引进造成了“性别”这个词的内涵的不固定,这是一个新现象。中国学界至今对社会性别理论还了解甚少,在短期内难以改造“性别”一词使其具有社会性别的理论含义。第二,性别(sex)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含义是不一样的,这点我赞同。近代以来在西方sex被视为gender的基础,男人女人的异性恋活动是界定男女的基础;而在中国近代以前,男人女人不纯粹是由其性倾向来界定的,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性观念跟西方近代以来对sex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性恋”一词,近代以前我们中国有同性恋行为吗?有很多,光《红楼梦》就有多处描写,而且男同性恋(尤其是上层男性)不回避、不隐晦,也不受歧视,从小说中看,在明清似乎颇为流行(近代以前对于女同性恋的描述很少,目前对历史上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性活动情况研究尚不多。对“现代化”与女同性恋话语在中国产生的关系,桑梓兰在她的近作中做了精辟的分析。见Tze-lan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为什么近代以前我们有同性恋的行为,但没有标识性的词——“同性恋”把它作为一种身份来界定?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这个现象,并指出传统中国对男女的界定并非与性倾向相关,也就是说,性不是界定社会性别的惟一基础。

性文化的差异和社会性别理论有关系。当代西方对性的讨论、对性的关注,确实是建筑在它自己本土历史之上的。正因为它的历史上对性有那么多禁忌,也才有福柯写《性史》,他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感到压抑,感到这种压迫,《性史》才能由他写出来,也才有那么多对性的探索与探讨。如果他们把性作为人的根本来界定,那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重新界定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有个重新的界定,当代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理论探讨。在他们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个大问题,必须投入很大的精力去解构批判。

而在我们的背景下,在近代以前性倾向不是界定人的身份的大问题。这可能不光是中国,还有亚洲文化圈。2000年我们跟韩国的学者在马里兰大学一起讨论时,她们借用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强制性的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是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写的,批判西方的异性恋制度和同性恋禁忌),开玩笑说她们认为西方是compulsory sexuality(强制性的性),因为西方学者花很大的理论精力来讨论性的问题,韩国学者认为西方不仅异性恋是强制性的,而且性的问题也是强制性的,笼罩一切的。亚洲人好像在这方面有同感。

我想说明我们的性文化背景跟西方有所不同,所以感受就有所不

同。在中国历史上,男人是同性恋也没关系(近期有些研究表明在同性关系中仍有等级含义),只要你做好儿子,孝顺,做好丈夫、父亲,你就是男人。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符合道德规范的角色你都扮演好,你就是好男人。在西方,你是同性恋,就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对这个差异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如果西方的很多理论是在性跟社会性别的紧密联系中探讨发展的,如果在我们的历史上性不是界定社会性别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那么我们是依据什么来界定社会性别的呢?中国社会性别的等级制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可以探讨的一个理论话题。那么是否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性文化跟西方的不同,中国对男女的界定基于人伦关系中的名分而不是生理的性,所以社会性别所标识的理论概念就不适用了?甚至会混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我想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理解。中国对男女性别的界定不具有西方那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并不等于这个“性别”认识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探究和批判,而这是 gender 这个词的核心。社会性别理论向本质主义和生物决定论挑战,但并非仅限于此。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全方位地考察社会性别等级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社会性别等级制同其他等级制之间的交叉关系,推动了 this 学术领域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大量的学术研究对我们发展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都是有启迪意义的。我们这个具有非本质主义“性别”观的文化毕竟是建起了男尊女卑的等级制,这是批判等级制的理论与我们的“本土”相关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近代以来,在介绍西方所谓的“科学理论”的同时,我们早已引进了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的认识论,当代中国的社会性别观早已是受了西方“污染”的,与古人对男女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女性”这个具有生理含义的词就是伴随介绍西方“性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在中国经历了百年西化的历史以后,要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划清文化界限是很困难的。

这里谈的不是哪个中文译词较准确的问题,在这个话题的背后是如何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国内有学者把女权主义理论说成是霸权的话语,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论的依据是什么。从我们这个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看,女权主义在中国显然不是话语霸权,我们妇女学学者还是非常边缘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霸权”的看法?这与谁在介绍这些理论有关。女权主义在中国是非常边缘的,但是由我们学会成员来介绍就会使人感觉不同。因为在今天全球的权力结构中,各地区之间是等级关系,在这个等级关系中,我们这些在美国工作的人来介绍女权主义,确实有一种权力关系

在里面,特别是对国内学者来说。这是我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我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我所处的地域和所获的学位使我在国内有种特殊身份,有种无形的特权,这种状况会使国内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学者感觉不好,甚至会使有些人因对我们特殊身份的反感而产生对我们所介绍的理论的抵触。如果运用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论述来看,我们的女权主义知识也可能成为一种权力,尽管我们本人不追求权力,但这种由知识造成的权力会使有些人感到压抑,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这是我个人无法摆脱的困境。在这个情况下,本土化的口号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是非常有赋权意义的,empowerment。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女权主义是能给妇女 empowerment,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各类人可以各种方式来实现 empowerment,我们也应该允许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找到 empowerment。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妇女如果你在社会创造当中觉得什么有力量,什么分析武器能让你觉得有能动性,有更大的创造性,你就去用。我们在做的绝不是一种宗教,没有必要叫人家一定要相信,宗教就是一定要让人皈依。我们在做的不过是介绍一种分析工具,你愿意用就用;如果觉得不好使,就不用;如果觉得别的工具更好使,你就用别的。我们自己愿意用,是因为觉得它还挺管用的,用这种分析工具能够看透一些现象,希望其他人也能用来看一看,看透了,识破了,被控制的可能性就小些。

但在用这个分析工具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怎么跟我们的实际联系。我觉得我们目前处于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在翻译介绍很多东西,包括办我们这个班,译介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译介的文本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这是好的地方,但是它的弱点是,毕竟这些东西是人家研究人家本土的东西,跟我们的不那么贴切,每一个理论都是本土的,都是针对它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产生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类没有共通的地方。比如我为什么觉得社会性别理论是可以共通的?因为只要人类都有组织性的活动,都有对男性女性的界定,那在这个层面上是共通的。但是不同的社会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规范,新中国成立 50 年这个社会性别规范起了多大变化,别说几千年历史,更是变化多端。还有中国那么大,上海和山西同不同啊?那就很不相同。更别说中国和美国的差异了。差异是很多的,我们拿那些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作品跨文化来讲,必然有隔膜的感觉。所以我们做老师的、做学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做自己的研究,要不然,光是翻译别人的,讲别国的研究,在上海人的话中就成了“跟屁虫”,没有自己的创造性。关键是要做自己的研

究,不光是本土的,是本乡本土的,每一个地区都要去研究。这是无穷无尽的学术课题,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用这些概念范畴看看我们怎么研究自己,在研究自己的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中怎样提出有创造性的见解来,深化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归根到底就是要做这些工作。

(该文是王政博士在2002年12月20日“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与教学法研讨会”上的发言,吴海玲录音整理,并由本人审校。作者系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中心教授,妇女史博士。)